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二月）

一、一贯道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事实

一贯道是本市数量最大的反革命组织，拥有二十万道徒，其首领都是汉奸、特务、流氓、恶霸地主之流，一贯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相勾结，进行破坏革命，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

远在抗日战争初期，该道即叛国附逆，认贼作父。道首张光壁被聘为汪精卫的外交专员，在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的指挥下，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北京一贯道道长张五福为日本宪兵队的顾问，以传道为掩护，到各地为日本特务机关搜取情报。大汉奸如褚民谊、周佛海、王揖唐、胡毓坤、江朝宗等都是一贯道的上层分子。他们散布顺民思想，宣传“不抵抗主义”，麻醉人民的民族意识，成为日寇统治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其组织就是在日伪政权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贯道又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如张五福、孙鸿亮等，都是当时北平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的情报人员；道首刘燮元、刘景泰、吕翰卿、吕善庭等都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任中心组长。从此，该道即完全变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工具，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解放以后，前华北人民政府虽曾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明令取缔

道会门活动，但一贯道不但不停止作恶，反而变本加厉。各地道首纷纷潜入本市 进行秘密活动 暗中整顿组织“化整为零”企图长期隐蔽 并训练道徒 抗拒政府法令 妄图颠覆人民政府。该道惯于造谣，许多反动谣言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如本市解放初期，他们散布变天思想 说：“穷人富不了 有钱人穷不了 共产党胜不了 国民党败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人民欢欣鼓舞 而一贯道则造谣污蔑 说：“万邦统一 势不久 满街怪物扭”。他们破坏生产 破坏土地改革 说：“分了地 将来还不都是人家的”。本市西郊挖掘长河时，他们又策动群众罢工，煽惑群众抗拒挖河修堤的紧急命令。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后，该道妄图策应，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夸张美帝力量 散布亲美恐美思想 制造“割蛋”、“割乳房”的谣言 扰乱社会秩序 对群众的生活影响很大 夜间不能睡觉 白天不能生产。

一贯道除进行反革命活动外，对被诱入道的无知落后群众也极其残酷地加以剥削压迫。他们制造出“人道免灾”之类的鬼话 诱骗群众入道，甚至以各种手段胁迫群众入道。待入道后则又以“功德费”、“开荒费”、“渡仙费”、“超拔费”、“尽孝心”等名目勒索钱财，道徒因而倾家荡产者难以胜数。而那些作恶多端的道首，则把掠夺来的财物任意挥霍，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张光璧到四川去时，一次就运走黄金一万五千两。他们又以开办“仙佛研究班”等名义进行“考色”、“奸污”、“坤三才”、“女道亲”。道首还常假借所谓“仙佛之命”拷打道徒 不少道徒被活活打死。他们又以“圣水”、“香灰”给道徒“治病”仅西郊海甸一地 因此而致死的道徒就有九人。

以上各种事实，充分说明一贯道无恶不作，罪行累累，对人民危害极大 必须严厉取缔。

二、取缔一贯道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

我们为了保护人民利益，镇压反革命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再度明令取缔一贯道的组织，宣布所有封建反动的道会门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两个月来，由于广大人民的积极协助，干部及人民警察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

第一、摧毁了一贯道的组织，惩办了首恶分子。共逮捕了首恶分子三百零一名，并将其中罪大恶极，怙恶不悛，解放后或登记中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如刘燮元、穆肇增、赵俊卿、王钟麟、安松樵、刘凤林、胡春霖、金景煦等判处了死刑。这些反动的道门头子早为群众所痛恨，若不坚决镇压，就会脱离群众，而取缔一贯道的工作也就无法贯彻。正因为这样做了，人民才满意地说：“该崩”，“崩得好”，“给人民除了大害”。被骗道徒也认为政府给他们“作了主”，“出了气”，“申了冤”，有效地推动了登记和退道工作。共登记了点传师以下，三才以上分子六千零三十一名，一般道徒声明退道的十七万五千九百五十三名，封闭了大小道坛一千二百八十三处，搜出了一贯道秘密做的国民党旗、美国国旗和许多武器子弹，查获了大批反动证件、道具。并有道首六百三十人已退还或将退还道费四十余亿元，有五分之二退道者得到了退还的道费。一贯道基本上被摧毁了。

第二、我们对被骗的道徒，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争取与挽救了许多误入歧途的道徒。因为他们入道动机和那些反动道首截然不同，大多数是由于落后迷信或被骗、被迫参加了一贯道。许多道徒作了道首的骗人、害人的工具，或被陷害、被欺骗而不自觉。为此，

我们在各区、各街道、村庄、工矿区召开了群众会，运用了报纸、广播、戏剧、宣传队、展览会等宣传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特别是在中山公园举办的一贯道罪证展览会，一月以来，观众已超过二十余万人，群众从这里可以看到一贯道勾结敌人进行反革命反人民活动的许多证据，道首所诈骗来的大量金银财宝，以及觉悟了的三才、坛主、点传师在这里现身说法，表演一贯道如何用扶乩来对道徒进行欺骗，揭发了一贯道的种种黑幕，这个展览会起着很大的教育作用。此外，经过道首的当众坦白，道徒的控诉，声明退道和清算道费，道徒们的觉悟已普遍提高，认识到了一贯道的丑恶和可耻、可恨，改变了他们原先的“道正人邪”的想法，认识到一贯道真是“邪道”、“恶道”，有的道徒羞愧不已，不少受过害、受过骗的则痛哭流涕，对一贯道深恶痛绝，并敢于起来控诉道首，向他们清算道费。许多人在登记退道后感到轻松愉快，有的得到了很多退道费，过了一个快活年。道徒们对政府挽救他们走出歧途，普遍表示衷心感激，他们说：“过去被五字真言拴着，没有得到解放，这次政府把我们脖子上的绳套摘下来了。”有的说：“政府帮助我们脱下了虱子皮袄。”又说：“我们参加了一贯道，政府不但不处罚我们，还帮助我们，把丢掉了的钱找了回来，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政府”。有的道徒得到了退道费立刻就买了毛主席的像片挂了起来，感谢毛主席给他们的好处。不少觉悟了的道徒积极参加了取缔一贯道的工作。

第三、取缔一贯道后，谣言显著减少，道徒纷纷转向生产。过去许多谣言，反动标语文字，都来源于一贯道。自从取缔一贯道工作进行以来，反动标语和谣言已很少发现，治安情况显著好转。过去许多道徒受了骗，不敢安心生产，在退道后，由于提高了觉悟，也有信心来搞生产了。如东郊区小庄村一百六十多个道徒，用追回来的道款组织起了合作社，买了农具，有的道徒把破产了的铺子恢复起来，有的买了三轮车，有的摆起了小摊，走向安居乐业。

今后还须继续努力，务求彻底肃清一切道会门组织，目前有少数应登记的分子还没有履行登记，其中，有的是因为仍有顾虑，不敢登记，有的则是有意顽抗。因此，取缔一贯道的工作，还须继续进行下去。没有登记和退道的分子只要进行登记、退道，政府决准予改过自新。但对有意顽抗，不肯悔过，或暗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经查出，定予严办。已登记分子，只要安分守法，停止非法活动，即可免予追究。

狱 中 斗 争 一 千 日

彭 镜 秋 “

一 、 被 捕

1934 年 11 月 12 日深夜，我和儿子一起被捕，被押到上海浦东拘留所。看守打开一扇铁门，我和孩子刚进去，门就“当啷”一声关上了。5 岁的毛毛吓得惊叫起来：“妈妈，门锁了！出不去了！”他挣脱我的手，绝望地拍打着门，哭喊着：“快开门呀！我要出去——”

牢房里空荡荡的，连块床板都没有。我抱着毛毛坐在冰凉的地面上，劝他，哄他，但是任何语言都不能解除他对冷酷现实的恐惧，声声撕碎人心。

过了几天，敌人将我们押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西北风嗖嗖吹来，床上没有被褥，我们娘俩紧紧地偎在一起，仍被冻醒，不能入睡。后来难友们知道了，借给我一件棉大衣，才好一点。

号子门上有一个洞，20 厘米见方，这是看守巡视检查用的。张越霞住在我的对面，乘人不备，我俩利用它交谈。洗衣服时碰到夏娘娘和周惠年，她俩装扮成婆媳俩，带着两个孩子，大家喊他们的

世纪同龄人彭镜秋，原名曾朴，湖南宜章人。早年受邓中夏同志的影响参加革命，参加过广州起义，曾在海陆丰坚持斗争，1928 年加入共产党，在安徽安庆、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本文记叙了她和战友们在狱中斗争情况。

孩子为囚童。那个小二就是后来的民航总局副局长李钊。

姚钱氏是政治犯 她年龄大 又是小脚 象个家庭妇女 敌人让她干杂务。她利用这个机会 了解情况 传递消息 帮助大家买零用东西。

敌人审讯了我 2 次就宣布判 5 年徒刑。1935 年 1 月将我解到南京模范监狱。

二、钱瑛挺身而出

到了模范监狱，看守把我带去见二科长二科长满脸横肉，凶神恶煞 问了我姓名之后 就训话 到这里来 要守这里的规矩 刑满了可以出去。否则 就送回司令部 加重判刑 我望着窗外 不加理睬。那个女看守点头哈腰连连说是，然后将我娘俩押到大号子。

女牢的大号子是个弄堂，两边各有几间房子，每个房子里关了 20 几个人，主要是普通犯，只有黄海民、张金保和我是政治犯，因为带着孩子关在这边。大部分政治犯都关在后面的一排小号子里。中间有一个院子隔开，这是放风的地方。

监狱每天开两顿饭，饭前大、小号子的犯人各有 15 分钟放风的时间。放风时 我有意朝后排的窗子望 政治犯都站在铁窗里 亲切地同我的儿子毛毛打招呼。

我在第 5 个窗里看到钱瑛同志，分别 7 年的战友，想不到在此见面。众目睽睽 我俩会意地望了望 好象第一次认识似的 寒暄了几句。

钱瑛当时化名彭友姑。 1928 年春我从海陆丰撤到香港，和她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她在广东省委工作，每次出去都带回不少书刊，好学不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周恩来、李立三分别找我们谈

话后 我和吴展^①离开香港就同钱瑛同志分手了。

监狱里 倒马桶 打饭是统一时间 大家都可以出来。一天钱瑛在弄堂碰到我 见左右无人 轻声问：“你承认是共产党员了吗？”

我吃惊地说：“没有”。那你的判决书上写的已承认”她严肃地说。

“我没有承认 敌人硬这样说。”我坚定地表示：“虽然马列主义的书读得不多 可是我站稳立场 决不动摇。”

“好 斗争在第一线 要站稳立场。”她鼓励我几句 匆匆离去。

钱大姐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同志，而且在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数九寒天 我没有被子 常常冻得难以入睡。钱瑛知道后 想方设法送来一床被子。这是很危险的，敌人严禁共产党活动。

过了几天，看守发觉我有了被子，马上来盘问。我不能连累同志 缄口不言。看守凶恶地说：“不说？那就是你偷的。”把我带到看守长那里。看守长平时打扮得妖里妖气 我们背后叫她“花瓶”。 “花瓶”指着我骂道：“看你面黄肌瘦的样子 是个大烟犯子 不是政治犯。被子从哪里来的？！”

我天天挨饿受冻，能不憔悴吗！我瞪了她一眼。

“花瓶”拿起鸡毛掸子 在我头上抡来抡去 威胁我 要我跪下。共产党员就是杀头，也不能给敌人下跪。无论她怎样威胁，我都是一句话：“我没有偷。”

“花瓶”又气又恼，把我押到二科。二科长马上命令打我的手心。板子抡圆了 重重地打下来 1、2、……20 右手马上像发面馒头一样肿得老高。

“被子哪里来的 不说 看我板子硬 还是你的嘴硬。再打 打

^① 吴展，安徽舒城人，中共党员，彭镜秋的丈夫。黄埔第一期学员，广州起义时任营长，率部队撤到海陆丰后，到安徽安庆做地下工作，1929年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春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后被张国焘杀害。

左手。”又是 20 下 我的左手顿时又青又紫 成个紫茄子。我还是一句话：“我没有偷。”二科长嘶叫着：“再打 5 下。”一共打了我 45 下，我仍不改口。他们给我加上手铐，押回牢房

十指连心，双手火辣辣地疼得钻心，又戴上沉重的手铐。我慢慢捱回牢房。等在门口的小毛毛一下子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大声痛哭。凄厉的哭声在弄堂回荡，难友们面有愠色，沉默不语。我望着孩子心疼如绞，悲愤难平。但我内心是平静的，我没有玷污共产党员的称号。

消息很快传到小号子，钱瑛不愿我背上小偷的罪名，为了保护我 挺身而出 质问二科长：“这么冷的天气 伍金华（我当时的用名）带着孩子 没有被子盖 谁无恻隐之心。被子是我给的 要杀要砍问我吧。你们要她母子俩冻死不成？！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忠于孙中山吗，你们的民生主义哪里去了？”

二科长张口结舌，恼羞成怒下令给钱瑛钉上手铐。

小号子里的全体政治犯立即宣布绝食，抗议虐待犯人。二科长见事闹大了，自知理屈，把钱瑛和我的手铐都取下来。这场风波才结束了。

事隔几十年了，钱瑛舍己为人，赤胆忠心的高贵品质仍激励着我。敌人惨无人道的折磨没有使她倒下，而林彪、四人帮的肆虐使她含冤而去。

这次绝食是女牢中第 4 次绝食斗争。第 1 次是抗议洗澡水不干净 第 2 次是声援牛郎夫妇，第 3 次是何宝珍同志质问二科长为什么不履行允许亲友送食物的规定，遭到毒打。全体政治犯绝食抗议。在我入狱之前，何宝珍已于 1934 年秋英勇牺牲。

三、绝 食 斗 争

我想到小号子和同志们在一起，下决心把孩子送走，写信给吴展的哥哥。大哥把孩子接回家，我对敌人说是我的表兄接走了。母子一别 14 年，直到 1949 年在组织的帮助下，毛毛才回到我的身边，他已是 20 岁的年轻人了。

孩子走后不久，我和刘张氏一起转到小 号子，一起关在 4 号。刘张氏是江西人，大高个子，小脚，只有 20 几岁。

本来监狱的伙食标准定的很低，再加上狱吏的层层盘剥，我们吃得更差了。发霉的米，里面掺了不少沙子、稗子。菜更是量少质差，2 个人的菜，连汤带水约一碗，泥沙、虫子、草根、烂纸就占了一半。我们把菜打回来，首先将菜叶子在汤里洗洗，挑出来。等汤渐渐澄清了，再将浮在上面的虫子、草根拣出去，将碗底的泥沙倒掉，每个人才能喝口汤。

在敌人的折磨下，刘张氏体力渐渐不支，染上了伤寒病，肚子疼得厉害，呻吟不止，不能吃东西，拉的是酱色的稀便。有些同志要求来护理她。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我的年龄大，学过几天护士，我俩在大号子时关在一起很有感情。我谢绝了同志们，独自护理她。狱中伙食差，又没有药，刘张氏的病一天天沉重。政治犯要求监狱当局送她到医院治疗。监狱当局一再延宕，直到刘张氏气息奄奄，病人膏肓，才派人拿了一副担架来了。这几个人粗暴地把刘张氏摔到院子里的担架上。刘张氏恋恋不舍地望着我们，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我们站在铁窗前，都知道她是凶多吉少，心情十分沉重。我们安慰她：你病好了，很快能回来。看守把刘张氏抬走了。一日、二日……十几天过去，刘张氏再也没有回来，她让敌人折磨死了。不久，杜凤鸣同志也病死在狱中。这一笔一笔的血账，我们总有一天要算

的。

刘张氏被抬走后 我调到了 7 号房间住 ,有廖金波、严淑芳、林玉娟、傅承敏。洗衣服时是 2 个号子的人一起洗。我渐渐和同志们熟了。

小号子里关了 30 多个政治犯 帅孟奇、夏之栩、耿建华、熊天荆关在 3 号 钱瑛关在 5 号。年龄最大的是耿建华大姐,她 43 岁,满头白发 缠着小脚 原是家庭妇女 后参加了革命。大家尊敬地喊她白头发大姐。第二位大姐是帅孟奇。我的年龄是第三大 ,35 岁,大家喊我老伍。狱中最小的 3 个小同志,一个是肖明 大家都喜爱她 叫她小宝 都跟她学文化、另一个是罗靖松,她是李维汉的女儿 小小的年龄参加了革命 她聪明好学。第三个是纪均 她不但年龄小 ,个子也小。原是新闻记者 她消息灵通 善于反映情况。

从难友的口中听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共产党人虽然身陷囹圄,从未放弃斗争,她们的事迹在难友中传颂。比如帅孟奇。敌人见枪毙、死刑吓不倒她 就说:“不让你痛快死 也不能好好地活着。”对帅孟奇同志动用重刑,灌汽油使之七孔出血,遍体鳞伤,坐老虎凳把她的筋骨折断,打掉她满口的牙齿,打得她死去活来。敌人失败了,酷刑没有使大姐屈服,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宣布无期徒刑,把大姐从宪兵司令部押到南京模范监狱,企图使她慢慢死在狱中。英雄的事迹在难友中传颂,激励着每一个人的斗志,使政治犯更加团结。普通犯人无不表示敬佩,觉得同这样的英雄一起坐牢,也不枉活一世。在司令部时有个女看守赞美大姐是少有的英雄,骂敌人太残忍,偷偷地买了一只老母鸡,用泥纸包起来送给大姐吃,补养身体。狱中的难友们纷纷献药帮助她治好了外伤。她因深度近视大家喊她“趋趋”

我们在狱中虽然没有正式地建立支部,但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以帅孟奇、钱瑛、夏之栩为核心领导的无形支部。这 3 位大姐

对敌斗争有策略、斗争火候掌握得好，领导我们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斗争。我们在狱中流传着一首囚歌，歌词是这样：

囚徒 不是囚徒是俘虏，
黄饭和苦菜，臭虫和蚊蝇，
只能瘦了我们的肉，
不能瘦我们的骨。
铁窗和脚铐只能锁住我们的身，
不能锁住我们的心，
不能锁住我们的思想。

我们誓把牢房坐穿，把监狱变成学校。大家以自学为主，能者为师 钱瑛、薛迅对政治经济学有研究 帅孟奇讲工人运动史 熊天荆讲算术。有的同志学习语文、世界语、英语 我学习政治经济学，但没有学好。

监狱当局不准我们看报纸和马克思列宁的书。但是邹韬奋编的《读书生活》 伊里奇写的书也可以看。愚蠢的敌人不知道伊里奇就是列宁。我们通过各种关系，请亲友给我们送来书刊，大家争相传阅、学习。

薛迅大姐不仅善于言辞，而且会绘画，她经常在纸上画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 栩栩如生 印在白布上 绣成美丽大方的枕头。耿建华心灵手巧，用布头或绸缎作成小猫、小狗各式各样的玩具，千姿百态。以我们全体同志的名义送给汪得珍同志的孩子。这个小男孩只有八九岁，他对这些礼物爱不释手。

汪得珍和牛郎是国际友人，一起在中国做国际互济会的工作，人都称为牛郎夫妇。1931 年不幸被捕。1933 年他们要求释放进行绝食斗争，小号子的政治犯为了支持他们的斗争并要求改善生活进行了绝食斗争。这次斗争轰动了社会，进步知名人士李德全、曹

孟君冲破敌人的阻挠到狱中慰问牛郎夫妇，并把狱中非人待遇公布于众，引起公愤。敌人不得不答应改善监狱生活。汪得珍每天可放风 1 小时，他的孩子每月探监 1 次，带来糖、板鸭，生活也得到改善，10 天可以买 1 次牛肉、鸭蛋。每月可以接见 1 次亲友，外面可以送东西、杂志。

汪得珍不同我们关在一起，午饭前，到我们前面的院子里放风。每次放风时，她见旁边没有人就走到 5 号窗前，用外语同钱瑛同志交谈，把外面的政治斗争，国内外新闻告诉钱大姐，并把孩子送来吃的东西交给大姐，请她转给同志们。有时她把孩子也带到院子里来，孩子活泼可爱，增添不少生气。钱大姐利用倒马桶、洗衣服等机会，把外面的消息告诉同志们。

监狱长秉承主子的意图，妄图把我们政治犯折磨致残、致死。所以管理越来越严，不时地搜查号子，把我们学习用的铅笔头、我们用罐头皮做的小刀（切咸菜头的）统统搜去。把每天放风的时间，由 10 分钟逐渐缩短。倒马桶、洗衣服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还不等我们做完，就往号子里赶。最后连开饭也不开号子门，敌人的虐待有增无减，激起了众怒。

钱瑛、帅孟奇、夏之栩 3 位大姐根据这些情况，先找了骨干分子研究对策，而后把办法交给群众酝酿、讨论。我们在敌人的魔掌中，力量对比是绝对悬殊，是背水一战，宣布绝食后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任何一个人的动摇、叛变都会导致斗争失败。必须要群众反复酝酿讨论，真正达到思想认识统一、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使斗争有始有终，做到不胜利不收兵。条件成熟了，3 位大姐宣布绝食，要求恢复吃饭开门、给洗衣服的时间、延长倒马桶的时间。

1936 年的一天，小号子的全体政治犯都躺下了，宣布绝食、绝水。放风的时间到了，看守故意把门大开，可是没有一个人起来。开

饭了，看守把勺子敲着饭桶吆喝着，仍没有一个人起来。

绝食的头一两天 起来小便时 头昏眼花 头重脚轻 只能扶床而行。小号子里寂静无声 到第三、四天耿大姐饿得吐起来 我在 7 号房间能清晰地听到。号子的难友们很镇静 互相鼓励着 安慰着。不一会儿 有咚、咚、咚的敲墙的声音 这是隔壁的难友问候我们。

绝食斗争轰动了监狱，住在大号子的难友乘着放风的机会，扒在窗上看我们，善意地劝我们吃饭，有个别的难友甚至边哭边劝我们进食。更多的人是竖起大拇指敬佩地说：你们有种！有义气！有的人说 我们大号子也绝食 支援你们 我们都予以劝阻。

绝食进行几天后，敌人慌了，把饭菜抬到通道来。几天没有吃饭了 没有喝水了 饥肠辘辘 口干舌燥 闻到饭菜的味道 更是饥饿难忍，可是没有一个人吃饭，更没有人自首。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破坏绝食。绝食斗争坚持到第 5 天、第 6 天，一直到第 7 天。敌人坐不住了 监狱长带着“花瓶”看守来了 找钱瑛同志谈判，基本上答应了我们全部要求，当场把全部号子门打开了。绝食斗争胜利结束了。

7 天来我们滴水未进，口干得嘴唇都裂了口子，嗓子眼直冒烟。饿得头晕眼花 站不起来 绝食斗争结束了 不能马上吃干的，大号子的难友送来糖，给我们冲糖水喝。难友们之间的战斗友情更加深厚了。

罢饭胜利后 敌人又调整房间 我调到 2 号房 住在上铺 对面的上铺是郭英，黄隽和肖明在下铺。郭英又叫郭纲琳。她是深度近视眼，被捕后敌人将眼镜没收，她时常将眼睛眯成一条缝，仍是看不清楚 大家叫她“三瞎子”。每天晚上我们睡下后 因为住在对面，长谈不已 友谊日渐加深。她在政治上坚定 斗争有策略 有水平，她嫉恶如仇，性情耿直。在生活上活跃、风趣。有一天她接到外面送来的食物 便写了一张字条 请大家来吃 我记得最后一句是“来

者不拒，不来不请”。同志们喜爱又尊敬她。陈同生写过《不屈的女战士郭纲琳》，详细地记述了她在狱中的斗争。

四、反省院的斗争

1936年5月我已刑满（国民党法律规定未判刑之前，在押一天顶两天）本应释放恢复自由。但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热潮日益形成，红军东渡黄河，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各个群众团体纷纷要求释放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的政策，为了遮人耳目，又办了反省院，将刑满的政治犯都押送到反省院，威胁我们说：只有悔过认罪合格，才可以从反省院“毕业”。否则不能自由。反省不好送回监狱再加刑，刑满后仍要到反省院反省。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也毕业不了，我们抱定牢底坐穿的决心到了反省院。

5月的一天上午，我告别了帅大姐、钱大姐等难友们，被押到反省院。

反省院在南京太平门晓庄附近，是专门为关政治犯新盖的。女牢的3个看守，两个是叛徒，一个是叛徒的妹妹。有的人意志薄弱，为了“毕业”和看守打得火热，情况比监狱复杂。敌人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法，讲课，个别谈话，组织娱乐活动，看电影，无非是显示蒋介石的威风，炫耀国民党兴办的工程。一天到晚宣传“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一套。胡说地球上只有一个太阳，中国只能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攘外必先安内等等谬论。妄图以此动摇我们的信仰，改变我们的主张。

一天敌人让我写自白。我装着不懂，故意问：“什么叫自白，怎么写？”敌人说就是写口供。我把在司令部编的假口供，简略地写了一遍。有意写得歪七扭八，错字连篇。

敌人为了分化瓦解，不时地找我们个别谈话。有一次把我找

去 问道：“你想出去吗？”

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不开门怎么出去。”

他嘻皮笑脸地说：“你反省了我们可以给你介绍工作。”

“用不着 我在这里有饭吃。”

有一天我正在房间里 听见走廊里噚、噚皮鞋声 越来越近。我估计敌人要开门进来，就背对门，面壁而坐。果然是国民党员郑大伦进来了 他虚情假意地问：“你不是有个孩子吗 我们可以负责送到孤儿院。”

我头也不回冷冷地说：“用不着，我的孩子早送到表兄家里去了。”

他见无隙可钻，悻悻地走了，临出门时哼了一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大约不到 2 个月的时间 我的难友——模范监狱的政治犯全部转到反省院。见到诸位姐妹们，格外地高兴，感到有了力量。我把了解到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钱瑛和其他几个同志。

国民党见屠杀吓不倒共产党人，就改用感化、反省，企图用软刀子杀人的办法来使共产党人屈服。为了“感化”政治犯 敌人有心把伙食办得很好，让我们到饭厅吃饭，白天不关号子门。大约有 1 个月的工夫 敌人发现不但没有“感化”了我们 反而被我们利用互相联系，互相鼓励，开展工作。敌人马上改变办法，不准随便出号子 每顿饭送到号子里吃 就是上厕所也要请示。

这时敌人不仅强迫我们做“纪念周”唱“党歌”而且按文化程度把难友分成甲、乙、丙班。在男牢还设研究班。班次越高 麻烦也越多，敌人要求研究班的人写文章。

我早已有提防，装成不会写字的样子，并说当了几年姨娘，在师范学的东西早已还给老师了，被编在丙班。丙班有 8 个难友 肖明、黄海民、纪均、姚钱氏、阿妹等。阿妹是农村姑娘 据说在被捕时

陪斩中得了羊角疯，到反省院后时常犯病。敌人知道她出去后不能再工作了，过了半年就把她放了。

夏之栩、熊天荆在甲班。

乙班人最多，有钱瑛、帅孟奇、薛迅、郭英、朱凝、罗靖松、黄隼，她们常常利用上课的时间和敌人斗争，搞得教官张铁君下不来台。张铁君有时也给全院讲课，他专讲辩证法，是讲精神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他把诸葛亮的八卦搬出来，说这是中国的辩证法，用不着到外国搬什么马列主义。还攻击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只能讲一个主义，等等，一派胡言乱语。我有一次乘敌人不备，到乙班门口去听，听到钱瑛正质问张铁君：“你说马列主义不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最好请把马克思主义著作拿来让大家看一看，也好同三民主义比较比较，看看究竟哪个好。”问得张铁君瞠目结舌。

丙班的课程比较简单，有党义、三民主义、家事、珠算。由一个烫发的“花瓶”讲党义和三民主义。她时常在课堂上提问。轮到我问答，我就说：“你讲得我记不住，脑子不好用。”拒绝回答问题。

有一次考试，我第一个交卷。“花瓶”打开卷子一看，偌大的一张纸写了一句话：“民者民也，生者生也，民生者民生也。”脸一沉问道：“我是这么讲的吗？”

我不紧不慢地说：“我记不得那么多。”

她暴跳如雷：“不准你出教室！”

我见她气得脸红脖子粗，暗暗高兴。走回位子，坐下练字。

反省院强迫每个人写反省日记，我们却在日记中写吃了一碗面条、散步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少有人按照敌人的要求写。

丙班的难友还要做工，我们为可以学到技术，就去了，一看是给敌人洗衣服，我下定决心不为敌人干活。洗衣服的地方，清清的水从石板上流过，像小溪一样。有一天我谎说洗衣服，让看守给我